

前 言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军事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军事文化贡献最大者则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伟大军事家。本书所介绍的十大军事家，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军事家？这是写作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经过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我们认为，作为一名军事家，起码得具备以下条件：

（一）军事家是一定军事任务的提出者。军事家对军事形势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转变军事形势的欲望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驾驭军事形势的能力比一般人也强得多。因此，他们能够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军事任务，并保证这些军事任务的落实。

（二）军事家是一定军事计划的制定者。军事家为了完成一定的军事任务，会制定相应的军事计划、步骤和方案。他们制定的计划、步骤、方案不但周到严密，而且高人一筹。如姜尚的“剪商”计划、孙臆的“减灶诱敌”计划等。

（三）军事家是一定军事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完成者。军

军事家提出的军事任务、制定的军事计划，有些由别人去实施完成，有些则由自己亲自来实施完成。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军事家往往要亲自参加。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普通的参与者而是这些军事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完成者。如决胜牧野的姜尚、五战克郢的孙武、围魏救赵的孙臆和出使西域的班超等都是如此。

（四）军事家是一定军事理论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一般来说，军事家既是成功的实践家，又是卓越的理论家。说他们是成功的实践家，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践在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下往往能如愿以偿。说他们是卓越的理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军事家通常都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伟大的军事家更是如此。有些军事家即使没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但其军事思想也是相当丰富和先进的。如袁崇焕“用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作战方针、“守关外以捍关内，抚西（蒙古诸部）以拒东（后金）”的战略思想、“坚壁清野，乘间击惰，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凭坚城用大炮，以守为主”的战术原则等等。

由于军事家是一定军事任务的提出者，一定军事计划的制定者，一定军事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完成者，一定军事理论的创立者和倡导者，因而能够对军事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作为军事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能在军事史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但是，军事家的历史作用再大，也不能离开普通士兵的作用。离开了普通士兵，即便是名闻世界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也不可能登上雄伟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顶。

军事家的历史作用不仅受普通士兵作用的制约，更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历史条件对军事家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乱世出军事家。军事家的产生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般说来，和平时期很难出现伟大的军事家，只有战争频仍、

军事冲突迭起的战乱年代，才是军事家辈出的时代。本书所介绍的十大军事家，无不出生于战乱年代。正是人类战争这个大舞台，为他们驰骋于军事领域、从而成长为军事家创造了客观条件。当然，军事家的产生又和他们自身的特点，如性格、能力、品德、知识结构等，紧密相关。军事家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二）时势造军事家。任何军事家都是在激烈频繁、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即都是由时势造就的。“时势造军事家”主要表现在时势召唤军事家，时势锻炼军事家，时势筛选军事家。在军事任务形成和成熟时，时势召唤军事家来承担和完成这一任务；军事家产生并投入军事斗争以后，时势又像熔炉锤炼军事家，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长才干，在长期的斗争中经过时势的筛选，真正伟大的军事家脱颖而出，永载史册，而与此相反，那些经不起检验的所谓军事家则必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三）阶级属性制约着军事家。在阶级社会中，军事家都是一定阶级的军事家，他们无不受当时的阶级关系和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状况及局限性的制约。本书所介绍的十位军事家都是我国古代剥削阶级的军事代表人物，他们的军事实践、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都代表着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并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制约和影响。

二

军事理论是军事家理论水平的反映。要了解一个军事家，除了要了解他的军事实践，还要了解他的军事理论。就军事理论而言，除了要了解其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还要了解其军事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贡献。这里我们不谈某一军事家的具体军事理论，只想就军事理论的一般问题作一探讨。

(一) 军事理论的产生。军事理论是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 没有军事实践之源 就没有军事理论之流。离开了军事实践 军事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因此 军事理论的产生不能离开军事实践。

(二) 军事理论的发展。军事理论应军事实践的需要而产生, 也随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军事实践不仅是军事理论得以产生的基础 而且是促进军事理论发展的动力。首先 军事实践不断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出新问题, 积累新经验, 提供新材料和新手段。其次 军事实践使军事活动的主体认识范围不断扩大、认识层次不断深入、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再次, 军事实践使军事理论的创立者——军事家本身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正因为如此 军事实践才能推动军事理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发展。

军事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军事实践, 也离不开前人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任何军事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建立在前人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上的 只有认真地学习、很好地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 才能不断发展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 学习和继承是捍卫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学习和继承, 就谈不上捍卫和发展。

(三) 军事理论的作用。军事理论应军事实践的需要而产生, 随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它是受军事实践决定、影响和制约的。但军事理论决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 它对军事实践也有积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正确的军事理论 是对军事实践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它能够指导人们去认识和掌握军事实践及其客观规律 并在军事实践中取得成功 反之 错误的军事理论, 是人们对军事实践及其规律的虚幻、歪曲的反映 它不但不能指导人们去认识和掌握军事实践及其规律, 还会使他们在军事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因此, 要很好地认识和掌握军事实践及其规律,

确保军事实践的成功，就要保证指导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的理論的正确性，尽量避免以错误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

（四）军事理论的检验。军事理论正确与否，靠什么来检验呢？靠军事实践。军事实践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和纽带，它的普遍性的品格，使它有可能成为检验军事理论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 而它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则使它能够将这种可能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军事实践作为检验军事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既具有确定性、绝对性 又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说它具有确定性、绝对性 是因为只有军事实践才是检验军事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此外再无别的标准，军事实践最终一定能鉴别出军事理论是否正确及正确的程度如何。说它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 是因为军事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 它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难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此外，军事实践对军事理论的检验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因此 我们既要看到军事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 又要看到它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只有这样 才能坚持唯物论、可知论和辩证法 同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僵化划清界限 才能既坚持正确的军事理论 又发展正确的军事理论。

三

本书所介绍的十位军事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为了使读者对他们的影响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本书在阐述他们的影响时，始终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一）既注意积极影响又注意消极影响。“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军事家也一样。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不能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 而应该对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出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介绍。

(二) 既注意国内影响也注意国际影响。本书所介绍的军事家中许多人及其军事理论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如姜尚与《六韬》、司马穰苴与《司马法》、孙武与《孙子》、吴起与《吴子》等。因此本书在介绍他们的影响时,不仅注意他们在国内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对于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作了力所能及的介绍。

(三) 既注意对历史的影响更注意对现实的影响。我们撰写《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奋国民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在介绍军事家的影响时,既注意他们对历史的影响,更注意他们对现实的影响。如在介绍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影响时,我们就不仅介绍了他的军事思想对孙武、孙臆等后世兵家的影响,而且着重介绍了他的“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以战止战”等军事思想对当前我国国防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 既注意人和事件的影响也注意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本书在介绍军事家的影响时,不仅介绍他们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质,介绍他们亲自策划和指挥的著名战役和历史事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而且介绍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对于中国军事思想史、世界军事思想史以及当代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影响,是对军事家各方面影响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不仅介绍了十位军事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而且对他们本人及其实践、思想和理论也作了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主要有:

(一) 坚持历史分析法。即把军事家放回到他所出生和活动的那个历史时代,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既不把他们没有的实践、思想和理论强加于他们,也不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苛求他们。

(二) 坚持阶级分析法。即通过分析这些军事家的阶级地位

及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认识和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活动、所提出的一系列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以便对他们的人品、思想、理论和实践作出客观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坚持矛盾分析法，即在评价军事家时，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原则，所谓坚持两点论，就是对这些军事家及其实践、思想、理论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既看到他们的辉煌成就又看到他们的不足之处，不搞片面性、绝对化、走极端的一点论。所谓坚持重点论，就是在两点论、两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清主与次、主流与支流、重点与非重点，不搞把它们并列起来、等看待的均衡论。

总之，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采取评传体的形式，写出每一位军事家的时代背景与生平活动、主要事迹贡献及影响与评价，是本书的基本体例和主要内容。坚持科学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力求客观公允，不以某种政治倾向作为评价军事家功过是非的根据；力求“精（人物精选，文字精炼），注重“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虚构，不妄评），力求文字生动活泼，雅俗共赏，有可读性，是本书的编写原则。而弘扬民族文化，发掘军事遗产，振奋国民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则是本书的写作宗旨和目的。

本书由陈晓和、陈迅合著。陈晓和负责姜尚、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臆和《前言》的撰写，陈迅负责尉繚、韩信、班超、李靖和袁崇焕等军事家的撰写。初稿完成后，陈晓和与陈迅分别对对方撰写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一起进行了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张传开、吴鹏森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撰写此书的机会，吴鹏森同志在我们的书稿完成后，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江晓蔚、张明、王军和殷素耘女士为打印书稿等不厌其烦，做了许多艰苦细致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于上述单位和同志

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撰写还参阅了大量的论著、文献，并从中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理论成果，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尽管在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正确、不全面、不深刻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7 年 12 月于南京半山园

姜尚 中国军事谋略 理论的奠基人

姜尚 商末周初东海 今山东郯 tán 城北)人。姓姜名尚 ,字子牙。曾辅佐周文王、武王、成王 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 作出过重要贡献。是我国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其军事思想被后人记载在《六韬》一书中。

一、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

姜氏家族起源于陕西宝鸡一带，姜尚的一位祖先在舜时因治水有功 受封于吕 今河南南阳西)所以人们又称姜尚为吕尚。

夏朝以后 吕氏子孙逐渐分化。到姜尚这一代 家里已经很穷了。他年轻时 为了维持生活 曾在商都朝歌 今河南淇县)宰过牛 卖过肉 后来又 到黄河之滨的孟津 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开过酒铺。姜尚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 但因生活窘迫 长期接触下层民众 所以对世态人情了如指掌。加上他勤奋好学 孜孜不倦地探究古今政治演变和军事斗争的得失成败，终于成了一名满腹经纶的旷世奇才。

姜尚晚年，正值商纣王统治时期。当时作为东方大国的殷商

王朝已步入全面危机的深渊，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奴隶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各方国、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都异常尖锐。以纣王为首的商朝奴隶主贵族骄奢淫逸，不惜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相杂其间，作长夜之饮。纣王又十分残暴无道，好用酷刑脯醢(hǎi)大臣、役使诸侯、残害百姓。因此大臣离心离德，诸侯时有背叛，奴隶和下层民众忍无可忍，争相铤而走险，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四海风起云涌、雷惊雨骤，预示着商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dǎn)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崛起。文王姬昌即位后，笃(dǔ)行仁政，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着意发展经济，坚持勤俭立国和富民政策，使社会秩序井然，国力空前强盛，远近民众无不向往，四方诸侯望风依附。

姜尚是如何加入周文王（那时还是商的西伯）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古籍中的记载，很不一致。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说，姜尚虽才智过人，但一直怀才不遇。后来，得知周国立志兴邦，求贤若渴，才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寻找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一天，周文王出去打猎，在渭水北岸遇到姜尚。他见姜尚满腹经纶、才智过人，就拜他为国师，让他辅助自己管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二是说，姜尚博学多闻，曾在商王朝中为官，因纣王无道，才脱离商王朝，到各诸侯国去游说，但都未引起重视，最后方归依姬昌。

三是说，姜尚原为隐士，不问政治。在姬昌被纣王囚于羑(yǒu)里时，周臣散宜生、闳(hóng)夭请他帮忙。姜尚见他们态度诚恳，情真意笃，才同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四是说：“太公望，齐之逐夫（被妻子抛弃的丈夫）朝歌之废屠

(宰了牛而肉又卖不出去的屠夫)子良之逐臣 被主人赶出去的佣人)棘泽之雠(chóu 义同售 怀庸 出卖劳力一直得不到雇用)文王用之而文。”

这四种说法虽各不相同 但都试图说明姜尚在入周之前 怀才不遇，政治地位低微，只是在受到姬昌这个明主的赏识和重用之后 才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 施展其宏图远略。

姜尚进入周统治集团后 运筹帷幄 屡建奇功。首先是辅佐文王姬昌完成了灭商战争的准备；其次是辅佐武王姬发实现了消灭殷商的宏愿 再次是辅佐周公姬旦、成王姬诵平定了叛乱 巩固了西周政权。

由于姜尚为三朝元老，功勋盖世，周成王时被封为东方营邱（今山东淄博东 齐侯。营邱之地 濒临东海 荒草丛生 居民少 野兽多 文化十分落后。营邱附近 有一支东夷族人——莱人 他们听说姜尚要到这儿来建国 便率众前来进攻“与之争营邱”。结果 被姜尚一举击溃。姜尚取胜后 政治上“因其俗 简其礼”经济上“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使国势很快就强盛起来。之后，周成王又授予齐征伐五侯九伯的特权，还授予它更多的土地。由此 在姜尚的苦心经营下 齐国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 成为周代最富有、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二、主要军事活动

辅佐文王 与谋剪商

姜尚进入周统治集团时 商王朝虽然危机四伏 风雨飘摇 但与周相比 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根据这种情况 姜尚为了壮大自己 削弱敌人 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最终赢得战略决战 采取了以下战略性措施：

一、制造假象 麻痹纣王

周国的强盛，使商纣王十分不安，为消除后患，他把姬昌抓了起来，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

姬昌被囚，使周臣散宜生、闳夭等人焦急万分，忙与姜尚共商解救之策。他们鉴于纣王听信谗言，贪恋女色，性喜游猎，便千方百计求得莘（shēn）国美女、骊戎骏马、有熊氏的九骊和许多奇珍异宝，而后买通商朝佞（nìng）臣费仲，托他将这些珍宝和美女进献给纣王。纣王为财色所惑，便传令赦免了姬昌。

救出姬昌后，姜尚清醒地认识到，商王朝对周族的兴起已非常警惕。如果周无视这一点，公开与商王朝对抗，就会遭到商的武力镇压，达不到剪商及壮大自己的目的。只有麻痹纣王，使其丧失警惕，周的发展壮大才有可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姜尚协助姬昌施展了以下计谋：

（一）伪示恭顺。一是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庙，祭祀商王的先祖；二是让商王到周的统治区狩猎；三是将许多叛离商王朝的小方国联合起来，形成实际以周为首的反商力量大联盟，而表面上却装着是由周来率领他们一同臣服于商。

（二）假装淫逸。在周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以造成姬昌已沉湎于享乐的假象。

由于上述谋略的运用，使虽然聪明但为自己的骄傲专横所蒙蔽的纣王产生错觉，认为姬昌并无与商争夺“天下”统治权的大志，是衷心臣服于自己的诸侯。还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于是从原来的“欲杀文王而灭周”，变为赐予特制的弓矢斧钺（yuè），使之专擅征伐大权，并放心大胆地将主要军事力量使用于东方。这既使商的实力因在东方战场上的消耗而大大削弱，为周将来的战略决战减少了阻力；又为周利用商军的东调，在西方扩大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提供了契机。

二、修德行善，争取人心

商王朝本来是一个人力、物力都非常雄厚的大国，由于“修政不德”，才使得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姜尚有鉴于此，便把修德行善、收揽人心，看作是“以国取天下”的关键，竭力辅佐姬昌推行“爱民”与“民同天下之利”的政策，赢得了人心。其具体做法是：

（一）实行“有亡荒阅”的政策，以争取奴隶主贵族的拥护，稳定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当时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奴隶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奴隶主贵族既害怕自己的奴隶逃亡，又竞相收留别人的逃亡奴隶，以致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极不稳定。周统治集团针对这一现象，制定了任何贵族都不得收留逃亡奴隶，必须将其归还原奴隶主的法律，并定期进行大规模的搜查。这一措施深受奴隶主贵族的欢迎和拥护。后世的奴隶主贵族曾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姬昌实行了“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可见它对西周王朝的建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二）实行重视民众生产及生活的政策，以争取平民百姓的拥护。由于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奴隶的大批逃亡，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影响很大，民众的生活极端困苦，特别是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等，更为困难。周统治集团针对这一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众生产及生活的政策。如市场交易不收税，农民助耕公田只收 $1/9$ 的税，民众可以任意在国有的湖泊中打渔，等等。由于这些政策的落实，使平民百姓得到了实惠，从而使周统治集团赢得了平民百姓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三）废除酷刑，并缩小施刑范围，以争取广大奴隶的拥护。当时各种刑罚的主要对象都是奴隶。因此广大奴隶对纣王滥施酷刑，深恶痛绝。针对这一情况，姬昌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清除炮烙之刑”（即将铜柱横架于地上，下置炭火，令有“罪”者赤足在烧红的铜柱上行走，使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坠落火中，极为残酷），他既然请求纣王废除酷刑，就不会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滥施酷刑。此外，他还规定，对犯罪者的刑罚，只及于本人，不牵连其妻子儿女。

这些措施，使奴隶们感到，姬昌要比纣王好得多，因而皆倾心于周。

由于以上政策的落实，动摇了商的统治，扩大了周的影响，从而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周的变化。

三、剪商羽翼 壮大自己

经过几年的经营，周的威望大为提高，附周的小国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剪除商的羽翼，壮大自己的力量，姜尚乘商军主力东调之机，辅佐周文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调解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芮（今山西芮城西）等方国部落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国。当时，虞、芮两国因田地问题发生纠纷。姬昌积极从中进行调解，并以忍让精神现身说法，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两国的纠纷，使他们成了周的友好邻邦。

（二）向西北和西南用兵 相继征服犬戎（今岐山以北甘、陕交界一带）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灭犬戎之后，大家在一起商议下一步打哪个国家。姜尚主张打西北的近邻密须国，文王的三儿子鲜反对说：“我听说密须的国君精明能干，先打它怕不合适吧？”姜尚说：“咱们要征服别人就要先打强的，先打不听话的。把强的、不听话的打败了，弱的、听话的不就好对付了吗？”文王很赞成姜尚的意见，就派兵攻打密须，还没有开战，密须的老百姓就先暴动了，他们绑着密须的国君归附了文王。

（三）组织军事力量东渡黄河，先后占领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邶（hán 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殷商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黎、邶是两个邻国，一北一南。而邶国又是商纣王经常打猎的地方。占领黎、邶两国后，周的军事触角便伸入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对其都城朝歌形成威胁。以后周人又顺势灭掉了崇国。周军兵临城下时，崇国的国君才从酒醉中惊醒，遂匆忙登上城楼，但见周兵已把都城围得水泄不通，一时不知所措。崇兵见周兵登梯攻城，闻风丧胆，有的不战而降，

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反过来做向导，崇都很快就被攻了下来。

（四）收买、离间纣王的近臣，使之君臣猜忌、离心离德。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记》记载说，姜尚与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就是用金钱收买纣王的近臣，作为间谍，收集商朝的各种情报。被收买者，除了这里谈到的费仲，还有贵族胶鬲和纣王庶兄微子等人。

（五）在沔（fēng）水西岸营建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使政治重心东移，意在同殷商争雄天下。至此，周国西为稳定的后方，东达江淮之间，南及江汉流域，西南入于巴蜀，成为足与殷商抗衡的奴隶制强国，为以后的灭商伐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观兵孟津 决胜牧野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称为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仍拜姜尚为国师，以其弟周公姬旦任姜尚的副手，继续为完成姬昌的未竟事业积极做准备。

文王在世时，大多数诸侯都听命于文王。文王死后，他们怎么办呢，这是武王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测试各方国对灭商战争的态度、检查军队备战的情况，姬发继位的第二年，就任命姜尚为总指挥，举行了一次灭商战争的实兵演习。周武王约集各部落、各方国，到黄河边上的孟津会盟，商讨如何收拾这乱糟糟的天下，借以试探一下各诸侯国的态度。到了规定日期，八百诸侯如数会齐，而且都说：“可以伐纣了！”可姜尚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对姬发说：“天道无殃，不可先伐（先发动战争）；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就是说光有天灾而无人祸，或光有人祸而无天灾，都不宜发动战争，只有两者皆备，才可以这样做。武王见姜尚说得在理，认为经过这次演习，已得知诸侯归向，检查了备战情况，达到了预期目的。于是“观兵”结束后，在姜尚的陪同下，察看了孟津一带的地形，布置了沿河防务，就又回丰京加紧进行

出征准备去了。

由于连年用兵东夷 商王朝的军事实力大为下降。这时 商朝统治集团内又发生了空前的危机 王子比干被杀 箕子被囚 太师庇比和少师疆叛商投周 整个商统治集团分崩离析 陷于混乱。

见灭商时机业已成熟 周武王就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 纣王是否可伐？”姜尚觉得已得天时、地利、人和 便毅然答道：“知天者不怨天 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 行 者昌 先事 行 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 反受其咎 时至不行 反受其殃。”武王闻言 下令兴兵伐纣。

出师前 武王请卜祝占卜 但占卜的结果是“龟兆不吉”、“风雨暴至”。深信“天命”并一向奉为军事行动依据的贵族公卿们 尽皆恐惧，姬发也犹豫不决。唯有姜尚，坚持按原计划发兵。他说：“顺天之道未必吉 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 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智（者）将不（以）为（法），愚（者）将拘（泥）之。若乃好贤而能用 举贤而得时 则不看时日而事利 不假（借）卜筮（shì）而事吉 不祷祀（sì）而福从。”武王听从了姜尚的劝告 以“殷有重罪 不可不发”为名 拜姜尚为主帅 率战车 300 辆，车兵甲士 3 千 徒卒 4.5 万 出兵东进。

行军途中 风狂雨骤、雷电交加 甚至拔树毁屋 折旗废乘。姜尚见上下交互不安 便把这肃杀之征巧释为对殷商的天怒之象 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 来推行人事 理直气壮地打出了吊民伐罪的旗号。

面对周军的义举 各地诸侯纷纷响应 庸、卢、彭、濮（pú）、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髡（móu 居今河南西部）等各方国部落的部队，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公元前 1027 年 12 月 28 日 周军由孟津东进 于 2 月 4 日拂晓 在距朝歌 70 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前来迎战的商军相遇。

2 月 5 日凌晨，武王在牧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誓师大会。他

列举了纣王听信宠姬谗言 不祭祀祖宗 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奴隶 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 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正义感和敌忾心。接着 他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 每前进六七步 就要停止取齐 以保持队形 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 以稳住阵脚 作战务必英勇顽强 投降者一律不准杀害 违犯纪律者 格杀勿论。

会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以 300 辆战车及 3 千甲士集中组成战车方队，令姜尚亲自率领，担任先锋突击任务。当时商军人数虽然超过周军，但主要成分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徒卒，缺乏对付周军以战车集团冲击、实施正面突破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纣师虽众 皆无战之心 必欲武王亟(jí)入”。在这种情况下 姜尚率领的战车方队一开始冲击 就出现了“纣师皆倒兵以战 以开武王”的局面。姬发乘势指挥联军主力投入战斗，“纣兵皆崩。畔 纣”于是一场决定两个王朝命运的大决战，一个早上就结束了，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朝歌后，分兵四出，继续征服附近的商属各小方国，基本上控制了商朝的统治区域。

助主平叛 巩固朝政

占领商地以后，对如何处理商王遗属，周统治集团内意见不一。姜尚主张斩尽杀绝 以除后患 召公主张区别对待，“有罪者杀 无罪者活”周公则主张兼取二者之长 既实施武力监视和镇压 又进行政治安抚和笼络 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意见 封纣王之子武庚仍居商地统治商民。为了防止商人复辟 武王派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 分别率军留戍于商地之东、西、北三个方向 以监视商人（史称“三监”）而后便班师回朝。武王返回周都后 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他死后，其子姬诵继位，称为周成王。因“成王幼弱”无力控制当时的局面 周公便“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他的这一做法 引起了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满 于是他们一面大造“公